

# 廣西反瞞產運動的成因和影響\*

王力堅\*\*

## 摘要

伴隨著大躍進如火如荼進行之際，1958 年底至 1960 年初，中共當局在大陸鄉村先後進行了兩次反瞞產運動。反瞞產是集體化（合作社／人民公社）的產物，集體化運動發展高潮的 1958 年，成為引發全國各地反瞞產運動的重要年分。就廣西而言，1958 年的形勢表現，主要從「浮誇風氣下的糧食大豐收」、「超前成立人民公社」、「糧食供給制與酬勞工資制」三方面引發反瞞產運動。1958 年的形勢給了廣西當局一個誤判的支點，即起自 1958 年大躍進高潮中虛構了農業大豐收的假象，在「大豐收」基礎上進行的高徵購無法落實，自然就質疑糧食被農民瞞產私分。由此發動的反瞞產運動，其實就是一個由誤判到騎虎難下，最終造成巨大悲劇的過程。

**關鍵詞：**廣西、大躍進、人民公社、反瞞產運動、大饑荒

---

\* 本文得兩位匿名專家學者寶貴細緻的審查意見，受益匪淺，謹致深摯謝意。

\*\*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暨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 一、前言

學術界一般認為，1959年2月22日，毛澤東（1893-1976）批轉趙紫陽（1919-2005，時任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報告表示：「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sup>1</sup>從而掀起全國性的反瞞產私分（下文簡稱「反瞞產」）運動：「毛澤東這個批示和廣東省雷南縣反瞞產私分的經驗傳遍全國。全國都搞起了反瞞產私分運動。」<sup>2</sup>「中央尤其是毛澤東根據廣東省委書記的報告，錯誤地相信農民普遍瞞產藏糧，從而在全國掀起一場『反瞞產』運動。」<sup>3</sup>

儘管如此，1958年全國各地已有反瞞產的行為，<sup>4</sup>廣西地方當局的行動似乎更早，1957年，中共寧明縣委在進行反右派鬥爭的同時，便發出「堅決開展反瞞產鬥爭」的指示。<sup>5</sup>1958年6月至7月，在大躍進熱潮中，貴縣、賀縣、柳江縣等即相繼開展了地方性的反瞞產運動。<sup>6</sup>尤其是經歷了轟轟烈烈的全國人民公社化運動後，廣西全境反瞞產運動接踵而至。1958年11月7日，《廣西日報》第2版刊載自治區黨委農村部通訊組的報導〈丟掉本位主義思

---

<sup>1</sup> 毛澤東，〈中央批轉一個重要文件〉，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八）》（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52。

<sup>2</sup>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9），頁400。

<sup>3</sup> 周飛舟，〈「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國省級政府對災荒的反應和救助研究〉，《社會學研究》，2003：2（北京，2003.3），頁54-64。

<sup>4</sup> 何翔，〈大躍進時期，高鶴縣的「反瞞產」運動〉，《源流》，2011：3（廣州，2011.2），頁30-31；張再興，〈「貴州事件」始末〉，《炎黃春秋》，2013：2（北京，2013.2），頁26-30；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頁677-698；林蘊暉，《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1958-1961）》（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頁129-225。

<sup>5</sup> 寧明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寧明縣志》（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8），頁238。

<sup>6</sup> 貴港市志編纂委員會編，《貴港市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頁30；賀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賀州市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1），頁38；柳江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柳江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1），頁18。

想，插上共產主義紅旗——我區普遍開展核產報豐收運動》，便宣明開展全自治區以「核產」（核實產量）為標榜的反瞞產運動。<sup>7</sup>可見，比毛澤東批轉趙紫陽報告早三個多月，廣西已經在全自治區範圍開始了反瞞產運動。

「反瞞產私分」，是中共當局針對集體化體制（合作社／人民公社）鄉村農民隱瞞農產品產量並私下瓜分的現象（行為）所採取的措施。「瞞產私分」，顧名思義為「隱瞞產量」、「私分產品」。前者是集體化前就有的行為，例如：1950年，廣西當局頒布的〈新解放區農業稅暫行條例〉，便是針對「地富瞞田瞞產」，採取「以農戶為單位，按人均農業稅收入累進徵收」的措施。<sup>8</sup>後者則是集體化之後的產物，即在集體（合作社／生產隊）瞞產的基礎上私分給社員（農民）。集體化時期的瞞產私分很大程度是因應、對抗浮誇風導致的超額徵購而產生。因此，所謂「瞞產」，多為當局基於高估產，認為基層（生產隊）所報實際產量為瞞產後的數量，估產與實產之間的差額被隱瞞了；而所謂「私分」，實質上大多是合情合理分配給農民的勞動所得（往往是微薄所得）。尤其是反瞞產運動中對農民全面性的搜刮剝奪（包括養家活命的口糧與種子糧、飼料糧），已遠超瞞產私分的範圍。縱使是真正的瞞產私分，即在滿足口糧、工分糧、徵購糧之外，私下瓜分餘糧，所佔比例也甚為有限。

據上可知，反瞞產與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密切相關，其中關鍵的連接點則是1958年初在廣西首府南寧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史稱「南寧會議」）。這就使廣西反瞞產運動具有更令人關注的可能性與必要性；而作為多民族聚居的邊疆地區，廣西反瞞產運動亦應當有值得研究的價值與意義。然而，關於廣西反瞞產運動的研究至今尚未見專門論述發表。筆者曾撰〈從「參與式」到「命令式」：廣西百色地區反瞞產運動初探〉一文，對1958年底

<sup>7</sup> 〈丟掉本位主義思想，插上共產主義紅旗——我區普遍開展核產報豐收運動〉，《廣西日報》（南寧），1958年11月7日，2版。

<sup>8</sup>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財政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5），頁195。

至 1960 年初廣西百色地區的兩次反瞞產運動進行了初步的探討。<sup>9</sup> 本文則將考察的範圍擴大到整個廣西，以期通過 1950 年代中期以降廣西農村形勢若干方面的表現，進一步探究廣西反瞞產運動得以發生的主要原因及其影響，並與〈從「參與式」到「命令式」：廣西百色地區反瞞產運動初探〉一文相配合，而能對廣西反瞞產運動有一個更為全面與完整的了解。相信本文對地方（政治／運動）史研究，亦不失有填補空白的意義及重要性。

## 二、浮誇風氣下的「糧食大豐收」

1957 年 12 月 16 日至 18 日以及 1958 年 1 月 3 日至 4 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開了兩次工作會議，「據毛澤東說，第一次無結果而散，沒有議出什麼名堂，第二次才積累一點意見。」杭州會議被視為是南寧會議的序幕。杭州會議一結束，毛澤東便於 1 月 6 日抵達南寧，緊接著於 1 月 11 日至 22 日，主持召開「範圍更大一點的中央工作會議」，這便是著名的南寧會議。<sup>10</sup> 南寧會議的主題是討論和研究 1958 年國民經濟計畫與國家預算。毛澤東在會議上對反冒進的言論進行了十分嚴厲的批判，強烈反對「洩氣」現象：「一反就洩了氣，六億人一洩了氣不得了。」「鼓足幹勁，乘風破浪，還是潑冷水，洩氣？」「反『冒進』，六億人民洩了氣。」「我們就怕六億人民沒有勁，不是講群眾路線嗎？六億洩氣，還有什麼群眾路線？」<sup>11</sup> 2 月 18 日在北京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又再次強調：「反冒進反得那麼厲害，把群眾的氣洩下去了，加上右派的猖狂進攻，群眾的氣就不高，我們也倒霉。」<sup>12</sup> 毛澤東如此反洩氣，應當是為了鼓足大躍進幹勁，卻也因此給浮誇風開了方便之

<sup>9</sup> 王力堅，〈從「參與式」到「命令式」：廣西百色地區反瞞產運動初探〉，《二十一世紀》，175（香港，2019.10），頁 63-81。

<sup>10</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頁 767。

<sup>11</sup> 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1958.1），收入不著撰人，《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1960）》（出版資料不詳），頁 6-9。

<sup>12</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6），頁 453。

門（寧願浮誇也不洩氣），否則出身於農村而且長期在農村活動的毛澤東，不會看不穿大躍進中農業高產衛星的騙局。

南寧會議對推進全國以及廣西大躍進形勢發展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就全國而言，國家經濟委員會黨組 1958 年 3 月 7 日的報告即稱：「南寧會議的反對保守、多快好省、力爭上游的精神，已經在我國經濟生活中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我國的解放了的生產力，像原子核分裂一樣，產生了巨大的能量，我國的經濟形勢已經發生極大的變化。」<sup>13</sup>就廣西而言，1958 年 1 月 22 日南寧會議結束，1 月 31 日至 2 月 15 日，廣西省委即召開一屆六次全體（擴大）會議，傳達南寧會議精神，大張旗鼓推行大躍進。8 月 10 日至 13 日召開地、縣委書記會議，更具體提出大躍進的指標，要求當年實現稻穀畝產「千斤區」，爭取達到「1,500 斤區」。<sup>14</sup>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9 月 9 日環江縣創造了中稻畝產逾 13 萬斤的全國最高記錄，由此將廣西農業大躍進推至高潮。

然而，毛澤東在南寧會議嚴厲批評反冒進，強烈反對洩氣，致使他所提出的「一些超過實際可能性的高指標」獲得會議一致通過，也促使中共「急於求成的『左』傾思想迅速發展」，<sup>15</sup>大躍進中無止境的浮誇風氣，其根源或可追溯於此。廣西所受的影響亦更為直接而顯著。<sup>16</sup>

在當時的輿論宣傳上，農業生產報豐收是「永恆的主題」，但在廣西，1958 年之前的宣傳尺度還是有所節制的。據玉林地區

<sup>13</sup> 國家經濟委員會黨組，〈關於一九五八年計畫第二本賬的報告〉（1958.3.7），收入宋永毅主編，《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電子版，香港：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2014）。

<sup>14</sup>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大事記》（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頁 328。另本文所徵引報刊與志書有關度量衡單位，有的用舊式度量衡，有的用新式度量衡（1959 年 6 月 25 日改制）；有的用「斤」，有的用「公斤」，本文一概保持原狀。為了便於分辨，本文所有超過百位的數字（包括引文的數字），一概採用千位分隔符號。

<sup>15</sup>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大事記》，頁 324。

<sup>16</sup> 羅平漢，〈發動「大躍進」的 1958 年南寧會議〉，《黨史文苑》，2014：21（南昌，2014.11），頁 27-33；劉紹衛，〈南寧會議與廣西的歷史考察〉，《柳州師專學報》，2010：2（柳州，2010.4），頁 75-79、頁 104。

《大眾報》報導，「被評為全國 1958 年農業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單位」的博白縣巨龍公社（原龍潭區），就只是以 1957 年底的生產水準「已超過了富裕中農」為成績。<sup>17</sup>百色地區《右江農民》報導，睦邊縣那坡農業社 1957 年的中稻畝產 2,905 斤便已稱是破了廣西「全省記錄」。<sup>18</sup>這些宣傳，其實已多少摻有水分，進入 1958 年後，這樣的標準顯然大為落後，大躍進「大幹快上」的熱潮一浪高於一浪：3 月 7 日，灌陽縣委召開春耕生產誓師大會，提出「1958 年，全縣糧食總產要在 1957 年 5,081.5 萬公斤的基礎上，達到 7,735 萬公斤，比 1957 年增長 52.22%；生豬年末存欄 154,300 頭，戶均 4.4 頭」。<sup>19</sup>7 月 11 日，柳江縣委召開全縣生產隊長以上幹部會議，「在會上『打擂臺，比幹勁』，鼓吹『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致使浮誇風愈演愈烈；會後各地田頭不斷出現『萬斤畝』、『五萬斤畝』、『十萬斤畝』的增產指標牌」。<sup>20</sup>9 月 6 日晚上，靈山縣委「召開全縣『慶祝全縣農村實現人民公社化』廣播大會。大會號召全黨全民苦戰 3 個月，實現晚稻畝產 1,500 公斤、紅薯畝產 1.5 萬公斤」。<sup>21</sup>

1958 年 8 月 29 日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對人民公社農業生產「在克服右傾保守思想」（即反洩氣）、打破常規所出現的飛躍發展形勢，寄予極高的期待：「農產品產量成倍、幾倍、十幾倍、幾十倍地增長。」<sup>22</sup>這顯然是轉述 1956 年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的期望：「將

<sup>17</sup> 〈一面走群眾路線的紅旗——記博白巨龍公社黨委書記卜功壽同志的事跡〉，《大眾報》（玉林），1959 年 2 月 11 日，3 版。

<sup>18</sup> 〈破全省記錄，畝產 2,905 斤——介紹那坡社中稻高額豐產經驗〉，《右江農民》（百色），1958 年 5 月 3 日，2 版。睦邊縣，原名鎮邊縣，1953 年改名為睦邊縣，1965 年再改名為那坡縣。為行文方便，除引述外，本文均稱為那坡縣。

<sup>19</sup> 灌陽縣志編委辦公室編，《灌陽縣志》（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頁 20。

<sup>20</sup> 柳江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柳江縣志》，頁 18。

<sup>21</sup> 靈山縣志編委會編，《靈山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頁 28。

<sup>22</sup> 不著撰人，〈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1958.8.29），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十一）》（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頁 446。

來會出現從來沒有被人們設想過的種種事業，幾倍、十幾倍以致幾十倍於現在的農作物的高產量。」<sup>23</sup>依照常識，農產品產量成倍增長已是奇跡，到幾倍、十幾倍，甚至是幾十倍增長，無疑是反常識反科學的癡人說夢。毛澤東的按語與中共中央的決議居然出現這樣言論，無疑給地方煽揚浮誇風大開方便之門。

〈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發布10天後，即1958年9月9日，在時任廣西柳州地委第一書記賀亦然（1918-2006）授意下、環江毛南族自治縣縣委第一書記洪華（1918-1972）主導，逾千縣直機關幹部、中小學教師及農民參與，並且有自治區黨委組織部副部長陳東（1914-2011）、農墾廳副廳長陳任生（1911-2003）、民政廳副廳長張顯龍（1904-1982）、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秦振武（1917-1995）、政協副主席丘辰（1903-1972）、政協委員莫樹傑（1898-1985）、柳州地區工交部部長張延年、組織部部長馬振東、廣西農學院院長孫仲逸（1898-1989）、農學院作物栽培學教授翁德齊（1901-1989）、遺傳選種學教授吳如岐（1910-1983）、廣西大學教授龍季和（1912-1981）等現場見證的情形下，環江紅旗人民公社通過併筭移栽、摻入舊穀、重複過秤等手段，製造出中稻畝產「實收乾穀」130,434斤10兩4錢（舊式度量衡）的超級大衛星。這是大躍進期間全國糧食畝產的最高記錄，使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夢想成真」，從而迅速將廣西農業大躍進的浮誇風推至登峰造極的地步。<sup>24</sup>

30年代，廣西在新桂系治理下，雖然已有初步現代化的發展，<sup>25</sup>但在50年代，廣西的經濟狀況與自然條件還是處於較為落後

<sup>23</sup> 毛澤東，〈《發動婦女投入生產，解決了勞動力不足的困難》按語〉，收入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頁675。

<sup>24</sup> 環江毛南族自治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環江毛南族自治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2），頁337-340；李甫春，〈畝產十三萬斤的神話與環江的現實——環江縣1958年畝產十三萬斤事件及其嚴重惡果的調查〉，《改革與戰略》，1989：3（南寧，1989.6），頁67-73；羅解三，〈實事求是，存真求實——讀《環江毛南族自治縣志·「大躍進」「十三萬斤畝」》的感想〉，《廣西地方志》，2005：5（南寧，2005.10），頁44-48。

<sup>25</sup> 參見朱泓源，《從變亂到軍省：廣西的初期現代化（1860-1937）》（臺北：中央

的處境。在南寧會議期間，毛澤東「耳聞目睹廣西工業的極端落後狀況，當即表示同意廣西在柳州建設鋼鐵廠等項目」；毛澤東關心雙輪樺犁在廣西的推廣情況，時任廣西副省長覃應機（1915-1992）只能如實回答：「廣西山地多，農民反映犁重牛拉不動，尚沒有普遍推廣。」<sup>26</sup>領袖如此關懷，無疑給廣西當局莫大的壓力，誠如學者所云：「廣西經濟比較落後，這對廣西是一個很大的壓力，要求儘快改變廣西落後面貌，因此比較容易接受『大躍進』急於求成而搞的高指標和浮誇風。」<sup>27</sup>因此，使中共「急於求成的『左』傾思想迅速發展」的南寧會議，極大催發了廣西大躍進全面追求高指標的浮誇風氣，在 9 月環江縣中稻畝產逾 13 萬斤的超級衛星之後，10 月更連放忻城縣日產煤 67 萬噸，鹿寨縣日煉生鐵 20 多萬噸的兩大衛星，獲得《人民日報》兩天內特發兩次社論喝彩。<sup>28</sup>

從當時的報刊報導及文革後有關志書記載可見，廣西各地的人民公社雖然未能再突破環江中稻畝產逾 13 萬斤的世紀記錄，但亦無不高調響應中央決議「農產品產量成倍、幾倍、十幾倍、幾十倍地增長」的期待：田林縣東風人民公社 1958 年糧食總產量由 1957 年的 679 萬斤一躍而為 1,001 萬斤，因此信心百倍，決心再接再厲，爭取 1959 年糧食總產量達到 1 億 1,520 萬斤。<sup>29</sup>陸川縣 1958 年全年糧食平均畝產 802 斤，比 1957 年增產 29.3%，提前實現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規定的指標。河池縣在 1957 年還要調入糧食 1,300

---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

<sup>26</sup> 陳欣德，〈毛澤東與南寧會議〉，《文史春秋》，1994：3（南寧，1994.6），頁 6；李藝，〈上海 16 家企業南遷始末〉，《廣西地方志》，2001：5（南寧，2001.12），頁 58-62。

<sup>27</sup> 覃平，〈對建國後廣西經濟建設的反思——《廣西社會主義經濟編年史》前言〉，《改革與戰略》，1987：3（南寧，1987.6），頁 42。

<sup>28</sup> 〈祝廣西大捷〉，《人民日報》（北京），1958 年 10 月 18 日，2 版；〈群眾運動威力無窮——再祝廣西大捷〉，《人民日報》（北京），1958 年 10 月 20 日，1 版。

<sup>29</sup> 〈東風公社乘東風，英雄群中更英雄，硬要糧食畝產八千斤，向那坡、城郊、百育、兩琶、東關、新州及全專區各公社提出挑戰〉，《右江日報》（百色），1959 年 3 月 1 日，1 版。

萬斤，而在大躍進的 1958 年，由於大豐收，不僅不要調入糧食，而且調出了糧食 600 萬斤。<sup>30</sup>靖西縣 1958 年糧食獲得空前的大豐收，糧食總產量達 9 億多斤，比 1957 年增產 3.6 倍。<sup>31</sup>東蘭縣長樂人民公社 1958 年糧食獲得空前的大豐收，總產量達 2,800 萬斤，比 1957 年翻了一番。<sup>32</sup>隆林各族自治縣顯然試圖趕超環江縣而「搞畝產 150 萬公斤的紅薯堆和畝產 15 萬公斤的稻田」，<sup>33</sup>雖歸於失敗，但仍竭盡所能力爭上游：1958 年糧食總產量從 1957 年的 8,200 萬斤躍升到 1958 年的 1 億 7,000 萬斤，增產一倍還多。<sup>34</sup>

於是，便有了自治區主席韋國清（1913-1989）在自治區一屆二次人代會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作如此總結：「1958 年，雖然遭受了特大的旱災，……仍然獲得了特大的豐收，糧食總產量達到 142 億斤，比 1957 年增長 31%。」可謂以特大豐收成績響應中央號召，實現「一個以糧食生產為中心的，農林牧副漁相結合的全面大躍進」。<sup>35</sup>然而，1958 年廣西糧食收成的事實卻是：

這一年，全自治區各地上報的糧食總產量為 114.5 億公斤，自治區估產為 150 億公斤。而後來經過核實的產量只有 58.605 億公斤，只比 1957 年增產 0.115 億公斤，虛報的產量高出實際產量的 95.7%。<sup>36</sup>

<sup>30</sup> 〈人民代表高歌大躍進，區人代會代表分組討論政府工作報告〉，《廣西日報》（南寧），1959 年 12 月 21 日，1 版。

<sup>31</sup> 〈扭轉右傾情緒，核實糧食產量，靖西三級幹部會報出 1,200 多萬斤糧食〉，《右江日報》（百色），1959 年 1 月 22 日，1 版。

<sup>32</sup> 〈中央決議象明燈，照亮了社員心，長樂公社三天核出糧食 195 萬斤〉，《右江日報》（百色），1959 年 1 月 20 日，2 版。

<sup>33</sup> 隆林各族自治縣地方志編委會編，《隆林各族自治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2），頁 113。

<sup>34</sup> 〈隆林各族幹部社員熱烈學習六中全會決議〉，《右江日報》（百色），1959 年 1 月 11 日，1 版。

<sup>35</sup> 〈繼續深入貫徹總路線，保證我區 1960 年國民經濟全面大躍進，韋國清主席在區一屆二次人代會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摘要〉，《廣西日報》（南寧），1959 年 12 月 20 日，1 版。

<sup>36</sup>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農業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5），頁 53。

由此可見，大躍進時期的報刊關於 1958 年糧食大豐收的報導，基本上只是虛幻的盛景。

前述現象，無論是事前的宣導還是事後的報功，均為大躍進高浮誇風氣的產物，最終卻落得現實中在「大豐收」的形勢下出現糧食「減產」、「不夠吃」，<sup>37</sup>「喊缺糧，要求國家供應糧食」的窘境。<sup>38</sup>但在當時，這種現實窘境卻被認為是基層幹部與農民群眾瞞產私分的結果，而「瞞報糧食產量，就抹殺了 1958 年大躍進的成績，使廣大群眾看不到人民公社的巨大優越性」。<sup>39</sup>由此自然引發當局進行「糧食清查、核產工作」的反瞞產運動，<sup>40</sup>「核產」與「豐收」怪異地組合為廣西反瞞產運動的指稱——「核產報豐收運動」。<sup>41</sup>《廣西日報》社論的標題便表明「核實產量，保證豐收」，即通過「核產」為假定的「豐收」背書，認為核實產量是「從積極的角度防止瞞產」。<sup>42</sup>核出「豐收」的數字卻見不到糧食，便認定是被農民瞞產私分了，於是，便有報導文章在「核產報豐收」的標題下，徑直宣稱要進行「群眾性的報豐收反瞞產運動」。<sup>43</sup>

政治威迫與榮譽／物質利誘雙管齊下，廣西反瞞產運動出現了如下表現：1959 年 3 月 2 日至 16 日，巴馬縣委召開四級幹部會議，認為 1958 年糧食產量從上年 2,850 萬公斤增至 5,500 萬公斤，產量翻一番，但有 1,750 萬公斤糧食「不知去向」，便斷定被瞞產私分到農民手中，從而在全縣再次掀起搞核產、反瞞產高潮；結

<sup>37</sup> 〈中央決議象明燈，照亮了社員心，長樂公社三天核出糧食 195 萬斤〉，2 版。

<sup>38</sup> 〈節約糧食光榮，賣餘糧受表揚，鳳馬大隊賣餘糧二十萬斤〉，《右江日報》（百色），1959 年 4 月 26 日，3 版。

<sup>39</sup> 〈核實糧食產量，鞏固人民公社，上游人民公社決心和資本主義思想作鬥爭〉，《右江日報》（百色），1959 年 1 月 20 日，2 版。

<sup>40</sup> 〈中央決議象明燈，照亮了社員心，長樂公社三天核出糧食 195 萬斤〉，2 版。

<sup>41</sup> 〈丟掉本位主義思想，插上共產主義紅旗——我區普遍開展核產報豐收運動〉，2 版。

<sup>42</sup> 〈核實產量，保證豐收〉，《廣西日報》（南寧），1958 年 11 月 7 日，2 版。

<sup>43</sup> 〈梧州南寧區開展核產報豐收運動〉，《廣西日報》（南寧），1958 年 11 月 15 日，2 版。

果促使基層幹部不得不違心冒報糧食產量。如該縣鳳凰公社黨委書記虛報了325萬公斤（實產213萬公斤），獲得胸戴大紅花上街遊行向縣委報喜的榮譽。<sup>44</sup>於是，即如《廣西通志·農業志》所說「虛報產量的結果是高徵購，造成糧食緊缺」，<sup>45</sup>巴馬縣也就是由於浮誇風導致高徵購，造成普遍缺糧現象，公社食堂只能提供「雙蒸飯」、稻草米糠饅。<sup>46</sup>龍勝族自治縣1959年2月開展反瞞產運動，「不少隊幹部被逼報高產。1958年全縣糧食實際總產量6,800萬斤，上報總產量1.1億斤，獲畝產『千斤縣』紅旗獎旗和汽車一輛」；次年就因嚴重缺糧而陷入饑荒，「全縣出現乾瘦、浮腫、子宮脫垂、小兒營養不良等病狀」。<sup>47</sup>

事實上，1958年上半年全國16個省、自治區已經出現缺糧、斷糧、鬧糧情況，廣西的糧荒災情是：

據29個縣965個鄉統計，缺糧缺錢的困難戶共有1,303,000多人，占該地區總人口的16.2%。又據13個縣統計，斷糧的有57,000多人。有的地區曾發生餓死人的情況。<sup>48</sup>

1958年普遍而無上限的浮誇風、高徵購、實際的糧食減產、接踵而至的反瞞產運動，勢必使如此糧荒災情雪上加霜。

上述現象可見一連串的連鎖反應：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反洩氣促進農業生產大躍進，而反科學的實質卻對農業生產造成極大破壞，反洩氣煽揚起的浮誇風虛構出「糧食大豐收」的盛景，更誤導了糧食徵購額的大幅提高。例如：1958年初南寧會議上，毛澤東表揚了那坡縣上一年那坡屯農業生產合作社中稻一造畝產800

---

<sup>44</sup> 巴馬自治縣志編委會編，《巴馬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3），頁336。

<sup>45</sup>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農業志》，頁53。

<sup>46</sup> 巴馬自治縣志編委會編，《巴馬縣志》，頁336。

<sup>47</sup> 龍勝縣志編纂委員會編，《龍勝縣志》（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2），頁9。

<sup>48</sup> 不著撰人，〈中央轉發中央辦公廳綜合的「關於十六個省、區缺糧、斷糧、鬧糧情況和各地黨委提出的解決措施的簡報」〉（1958.4.25；中發〔58〕333號），收入宋永毅主編，《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電子版，香港：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2014）。

公斤，當年8月中旬，掀起大躍進的高潮，大躍進掀起的生產浮誇風，導致糧食高估產、高徵購，層層浮報產量和徵購。那坡縣1958年的徵購數額便在虛構的大豐收數據上比1957年激增了93.9%。然而，那坡縣1958年實際的糧食產量卻是下降了6.3%，農民人均口糧則減少了24.3%。<sup>49</sup>前述中稻畝產逾13萬斤的環江縣，更理所當然實施高徵購，「1958年，地委下達給環江縣糧食徵購任務為0.355億斤貿易糧，比1957年實際完成數多4.5倍，比1957年全縣總產量還多178萬公斤」；後經再三請求調減為0.28億公斤，也只能完成0.134億公斤；次年全縣便陷於嚴重饑荒，「結果當年造成了3,000多人的非正常死亡（13.5%為正常死亡率）。」<sup>50</sup>

就全廣西而言，文革期間自治區農糧部門造反派編撰的傳單披露：1958年10月下旬，廣西自治區黨委在全自治區地委農業書記會議上，對當年全自治區的糧食產量「提出XXX億斤至XXX億斤，比實際產量高出一倍半以上」，經過多次調整，仍達到「起碼（比57年）翻一番以上」的數額；1958年11月，在廣州召開的全國農業書記會議上，廣西自治區農業書記伍晉南（1909-1999）再臨時加碼一百多個億，上報中央的糧食總產量便等於實際產量的3倍多。傳單抨擊：「這樣的浮誇，引出了高徵購和一系列的惡果！」並直指「這是後來『反瞞產』的前提」。<sup>51</sup>這些文革傳單固然有派性的立場，但關於高浮誇引發高徵購，徵購不到糧食導致反瞞產的批評，卻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即如《廣西通志》所記述：「〔廣西當局〕把在大躍進中虛報產量、高徵購、放開肚皮吃飯所引起的缺糧情況，說是下面『瞞產私分』造成的，群眾手中還有糧

<sup>49</sup> 那坡縣志編纂委員會編，《那坡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2），頁15、頁289。其中一些百分比數值的技術性修正，為中央大學中文系博士生李達同學所貢獻，特此致謝！

<sup>50</sup> 環江毛南族自治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環江毛南族自治縣志》，頁341。凡本文引文中的圓形括號為原文所有，六角括號則為筆者所加。

<sup>51</sup> 區黨委農村政治部、區人委農林辦公室、區貧協籌委會聯合兵團、區糧食廳「東風」聯合戰鬥團，〈誰是廣西反瞞產的罪魁禍首？——廣西反瞞產事件調查〉（1967年5月31日文革傳單），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平樂縣聯合總部，1967年6月30日翻印，作者自藏。傳單圖已附於文末，見「附錄1」、「附錄2」。

食。於是，在全自治區開展『反右傾運動』和『反瞞產私分鬥爭』。」<sup>52</sup>

### 三、超前成立人民公社

1951年9月，土地改革仍在如火如荼進行，中共中央即召開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毛澤東主持起草並於同年12月15日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布了〈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sup>53</sup>規劃由低級到高級，逐步引導農民走集體化道路。於是，經由中共建政初的互助組到（初級至高級）合作社的發展，至1958年初南寧會議毛澤東反洩氣，更進一步促成人民公社化的大躍進。

1956年至1957年，廣西各地掀起由小社併大社，進而升為高級社的熱潮，「速度之快，規模之大，均出意料，到1956年底，全省共有高級社10,808個，入社農戶4,164,069戶，占全省總農戶的95.10%」。<sup>54</sup>南寧會議期間，毛澤東獲悉廣西併大社現象便指示「可以搞聯邦政府，社內有社」。有關部門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起草了〈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併為大社的意見〉。該意見於4月8日經政治局會議批准，作為中央意見正式傳達下去。<sup>55</sup>毛澤東此舉，不僅推進了全國併大社的熱潮，更對廣西農村集體化由高級社向人民公社過渡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由此亦可見中央決策和廣西之間在集體化運動上彼此加強的互動關係。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擴大會議，8月29日，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sup>56</sup>至當年底，全國性的人民公社化即基本完成。周恩來（1898-1976）在〈偉大的十年〉一文中宣稱：「1958年是人民公社化

<sup>52</sup>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農業志》，頁55。

<sup>53</sup> 不著撰人，〈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1951.12.15），收入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頁411-423。

<sup>54</sup>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農業志》，頁48-52。

<sup>55</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12-513。

<sup>56</sup> 不著撰人，〈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1958.8.29），頁446-450。

勝利的一年，中國農業生產大躍進中出現的全國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發展，將 1 億 1,000 多萬個個體農戶組織成為 2 萬 4,000 多個公社。」<sup>57</sup>

廣西人民公社化的形勢發展似乎更有「超前」表現，自治區黨委在〈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通過前 3 天，於 8 月 26 日發出在全自治區建立人民公社的指示。《廣西通志·農業志》記載：

早在中央決議公布前，自治區黨委根據北戴河會議的精神，於 8 月 26 日就發出了〈關於在農村中建立人民公社的指示〉，要求全自治區在秋收前基本完成建立人民公社的工作。9 月初，正式傳達了中央的決議，到 9 月 13 日統計，全自治區在原有 1 萬多個農業社的基礎上經過合併、升格，建成了 918 個人民公社，入社農戶 404 萬戶，佔全自治區總農戶數的 97% 以上。前後不到半個月，全自治區就實現了人民公社化。<sup>58</sup>

倘若考察廣西各縣市基層，可見還有更為積極（激進）的表現。其實，各縣市基層並非需要上級機關統一指令，便已聞風而動——從報刊媒體的報導即自覺啟動人民公社化運動。《賓陽縣志》的記述可見一斑：

1958 年夏毛澤東主席視察河南、山東省後說：「人民公社好」。報刊公布不久，蘆墟鎮委於 8 月 19 日召集幹部討論成立人民公社的工作。20 日晚召開 1.8 萬多人的群眾大會進行宣傳動員，會上舉手表決心，會後寫申請書、保證書。至 23 日，全鎮 4,617 戶，1.86 萬多人，全部報了名，當晚召開成立大會，並通過名稱為：「賓陽先鋒人民公社」。新橋鄉經過 4 天的醞釀、報名，也於 8 月 24 日召開大會，宣布成立

<sup>57</sup> 〈偉大的十年〉，《人民日報》（北京），1959 年 10 月 6 日，2 版。

<sup>58</sup>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農業志》，頁 54。

「賓陽大躍進人民公社」。<sup>59</sup>

於是，不少縣市基層人民公社成立的時間點大大超前於自治區黨委根據北戴河會議精神發出〈關於在農村中建立人民公社的指示〉的「8月26日」。諸如：宜州縣——「於8月15日以鄉為單位建立22個人民公社，原115個高級社改稱生產大隊，下屬2,500個生產隊。」<sup>60</sup>來賓縣——「8月15日，鳳凰農業社首先成立人民公社，8月22日，全縣以區為單位，敲鑼打鼓成立人民公社，在4天之內實現人民公社化。」<sup>61</sup>柳城縣——「8月19日起僅三天時間，將全縣18個鄉（鎮）組建成16個人民公社；當時急於向全民所有制過渡，『跑步進入共產主義』，8月21日把16個公社合併成立柳城人民公社一個公社，分為公社、總隊、大隊、中隊四級管理。」<sup>62</sup>臨桂（靈川）縣——「8月22日臨桂縣第一個人民公社——五通紅旗人民公社成立；23日，中共桂林地委、中共臨桂縣委在五通召開萬人幹部群眾大會，總結推廣五通的『經驗』；迄至8月29日，全縣17個鄉紛紛建立『政社合一』的17個人民公社（屬今靈川9個）。」<sup>63</sup>石龍（象州）縣——「1958年8月22日，石龍鄉首先建立人民公社；至25日凌晨3時，全石龍縣230個高級農業社，合併建成34個人民公社。」<sup>64</sup>柳江縣——「8月22日至25日，全縣21個鄉117個高級農業社合併為8個人民公社，全縣50,742戶農民和

<sup>59</sup> 賓陽縣志編纂委員會編，《賓陽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頁211。

<sup>60</sup> 宜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宜州市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頁154。

<sup>61</sup> 來賓縣志編纂委員會編，《來賓縣志》（北京：知識出版社，1994），頁89。

<sup>62</sup> 柳城縣志編輯委員會編，《柳城縣志》（廣州：廣州出版社，1992），頁75。

<sup>63</sup> 靈川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靈川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7），頁18。1954年6月，靈川縣與臨桂縣合併為一縣，稱臨桂縣；1961年6月，臨桂、靈川分置為二縣。

<sup>64</sup> 象州縣志編纂委員會編，《象州縣志》（北京：知識出版社，1994），頁483。石龍縣舊名象州，民國元年，象州改稱象縣。1952年9月，象縣與武宣縣合併，改稱石龍縣，縣城暫設於武宣鎮；1953年6月遷至石龍鎮。1960年5月30日，石龍縣更名象州縣。1962年3月，復置武宣縣，象州縣城遷至象州鎮。

1,103戶城鎮居民，全部轉入人民公社，實現了人民公社化。」<sup>65</sup>

超前成立人民公社並非僅是廣西如此，毛澤東視察過的河南、河北、山東等地有更為激進的表現。<sup>66</sup>廣西的積極性表現在廣西是一個具有「革命傳統的老區」——左右江地區為1930年代初鄧小平（1904-1997）等發動紅七軍與紅八軍起義的老根據地。「老根據地幹部群眾永遠和黨一條心」的認知，<sup>67</sup>使廣西幹部與群眾對有關運動和政策的熱情與幹勁更為高漲。同時，廣西又更是少數民族聚居而經濟發展相對落後的地區，老根據地歷史榮譽感與現實發展落後挫敗感的反差衝擊，使當地民族幹部倍感壓力：「漢區已轟轟烈烈，三江不趕上，幹部、群眾會感到落後而不滿意。」<sup>68</sup>因此三江侗族自治縣在集體化運動中表現積極，迎頭趕上，到1956年底，全縣建立高級農業合作社200個，參加農戶38,830戶，占全縣總農戶的99.7%。<sup>69</sup>該百分比超於同期全廣西入社農戶總數的95%。<sup>70</sup>在人民公社化熱潮中，三江更一度將全縣10個人民公社合併為一個大公社（只維持了2個月便分開）。<sup>71</sup>隆林各族自治縣同樣為了政治上積極表現，以15天時間，全縣實現了人民公社化，連之前不參加農業合作社的瑤族等少數民族農民也被動員加入了人

<sup>65</sup> 柳江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柳江縣志》，頁18。

<sup>66</sup> 袁德，〈對河南省首先實現人民公社化的歷史考察〉，《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6（新鄉，1997.11），頁54-58；羅平漢，〈1958年的神話：「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黨史文苑》，2014：15（南昌，2014.8），頁26-33；李春峰，〈徐水共產主義試點始末〉，《黨史博采（理論）》，2006：2（石家莊，2006.2），頁22-25。

<sup>67</sup> 〈老根據地幹部群眾永遠和黨一條心，巴馬1天報糧1,600萬斤〉，《右江日報》（百色），1959年3月11日，1版。

<sup>68</sup> 不著撰人，〈中共廣西省委批轉省委統戰部民族工作組關於三江侗族自治縣目前互助合作運動情況與今後工作意見的報告（節錄）〉（1955.1.10），收入宋永毅主編，《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電子版，香港：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2014）。

<sup>69</sup> 三江侗族自治縣志編纂委員會編，《三江侗族自治縣志》（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2），頁15。

<sup>70</sup>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大事記》，頁314。

<sup>71</sup> 三江侗族自治縣志編纂委員會編，《三江侗族自治縣志》，頁242。

民公社；<sup>72</sup>龍勝自治縣更是以「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速度，「一夜電話會，全縣實現人民公社化」。<sup>73</sup>這些民族地區集體化運動的積極表現，有違 1955 年確立的民族地區「慎重穩進」的政策，及「防止盲目硬趕漢族地區」的批評。<sup>74</sup>但據此亦可見，這種民族政策事實上到 1958 年南寧會議後已被激進主義所取代。

人民公社的成立，對農民生活的改變，最顯著的就是一切生產資源甚至生活資源歸於公社。雖然日後當局對農民個人資產及自留地等政策有所調整，<sup>75</sup>但人民公社化熱潮高漲時期（1958 年 8 月至 9 月），共產風是橫掃一切的：「一切生產資料歸公社所有，取消自留地，取消社員家庭副業。全公社統一核算，統一分配，……社員家庭所有的糧、菜、油、鹽、豬、雞、鵝、鴨等一律交給公共食堂。」<sup>76</sup>「把群眾的自留地、畜禽、開荒地、園地、生產工具、林木、果樹、魚塘、糧食、炊具等全部收歸公社。」<sup>77</sup>「社員的自留地、飼料地、菜園及林果樹，收歸公社統一經營，社員的豬、雞、鴨、鵝，收歸公社集體統一飼養，社員的住房可由公社調整借用。」<sup>78</sup>甚至出現近乎荒唐的場面：「1958 年 8 月，縣裡在六排廣場召開千人大會，慶祝人民公社成立。一位縣領導宣布：『成立人民公社了，今後除老婆以外，其他都是公共的。』」<sup>79</sup>

如此嘉年華般的全民共產，實質上是對農民個人私有財產全面而徹底的剝奪。隨著個體經濟基礎的瓦解，農民個人的自主性亦隨之喪失，人身自由亦消失於無形。取而代之的是毛澤東所讚

<sup>72</sup> 隆林自治縣地方志編委會編，《隆林自治縣志》，頁 478。

<sup>73</sup> 龍勝縣志編纂委員會編，《龍勝縣志》，頁 132。

<sup>74</sup>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大事記》，頁 300。

<sup>75</sup> 不著撰人，〈中共中央關於社員私養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個問題的指示〉（1959.6.11），收入宋永毅主編，《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電子版，香港：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2014）。

<sup>76</sup> 博白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博白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頁 148。

<sup>77</sup> 來賓縣志編纂委員會編，《來賓縣志》，頁 89。

<sup>78</sup> 象州縣志編纂委員會編，《象州縣志》，頁 483。

<sup>79</sup> 天峨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天峨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頁 194。

賞的「三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產紀律化)的人民公社新生活,<sup>80</sup>農民被納入到以人海戰術為特徵的集體大生產乃至大躍進時期眾多的大煉鋼鐵、興修水利等大型工程之中:「人民公社實行組織軍事化,生活集體化,行動戰鬥化,將勞動力按軍隊編制組成班、排、連、營,採取大兵團作戰的方法,從事農業生產。」<sup>81</sup>「1958年9月至1959年初,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按公社、大隊、生產隊,編成團、營、連,抽調大批勞動力上水利、煉鋼鐵搞協作,大刮共產風。」<sup>82</sup>「(1958年)9月23日,全縣抽調1.7萬個勞動力到鹿寨縣英山公社大煉鋼鐵,前後4個多月;另抽調6,500多個勞動力,到宜山縣修龍江河水利,到1960年才完工。」<sup>83</sup>

農村勞動力大量調撥到煉鋼、興修水利等大型工程,致使農業生產遭受極大破壞:來賓縣人民公社化後,勞動力按軍隊編制為團、營、連、排、班,實行「三化」,接著又調撥全部勞動力砍樹燒炭,大煉鋼鐵,致使糧食損失嚴重。當年糧食比上年減產22.28%,社員人均口糧僅140多公斤。<sup>84</sup>甚至出現風調雨順農作物豐收在望卻無人收割而造成減產歉收的惡果:資源縣將人民公社大批勞動力轉為大辦水利,大辦交通,「由於農村勞動力80%以上被抽調上工地,極大影響了正常的農業生產,……1958年風調雨順,本應有個好收成,但當年糧食總產卻只有3,216.1萬公斤,還低於1956年的水平」。<sup>85</sup>而且,還造成物質資源的集中性消耗與浪

---

<sup>80</sup> 毛澤東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稱讚:「這三化的口號很好,這就是產業大軍,可以增產,可以休息,可以學文化,可以搞軍事民主。」參見毛澤東,〈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58.8.30),收入不著撰人,《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1960)》(出版資料不詳),頁113。「三化」在現實中的具體表述大同小異。

<sup>81</sup> 武宣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武宣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5),頁415。

<sup>82</sup> 賓陽縣志編纂委員會編,《賓陽縣志》,頁211。

<sup>83</sup> 柳江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柳江縣志》,頁18。

<sup>84</sup> 來賓縣志編纂委員會編,《來賓縣志》,頁89。

<sup>85</sup> 資源縣志編纂委員會編,《資源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頁254-255。

費，甚至造成無謂的人命傷亡：1958年入秋後，田林縣就調集3萬多農民進山大煉鋼鐵，並且派武裝民兵封鎖進出山的路線，爾後發生糧荒，糧食供應不上，餓死了不少人，以致文革知青下鄉時還有「五八年餓死人」的傳聞。<sup>86</sup>

由上可見，人民公社最顯著的弊端恰恰就是其「一大二公」（即規模大、公有制）的「優越性」。廣西人民公社化的這個弊端很快就顯露出來：「這樣大規模的經濟組織，把原來經濟條件不同，貧富差別很大的農業社合併在一起，實行統一核算和分配，導致嚴重的平均主義，窮隊『共』富隊的『產』。」<sup>87</sup>從而激發了農民為避免「共產」、維護各自小集體（生產隊）自身利益的瞞產私分行為。於是，合作社時期就普遍存在的瞞產私分得以惡化發展。前述大躍進浮誇風與人民公社化表現積極的隆林縣與田林縣便出現了如此現象：隆林縣在1958年秋收時，由於不相信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不相信公共食堂能辦好，「不少幹部和社員把成千上萬斤的糧食拿到岩洞裡去收藏起來。私藏糧食時，不少公社的隊幹竟起了『帶頭作用』。」<sup>88</sup>

田林縣百樂超美公社長吉大隊在1958年秋收後，「人人都埋伏糧食，把近30萬斤糧食拿到山上、水溝、屋旁、樹腳等20多個地方埋藏起來」。大隊長帥天貴認為「打埋伏糧」（瞞產）是普遍現象，別的大隊瞞產，自己大隊不瞞產會吃虧，於是就默許了社員群眾的瞞產行為，社員群眾就越發大膽搞起瞞產來了。<sup>89</sup>

如此普遍的瞞產現象，大多由於基層幹部與農民很清楚，秋後的高額徵購所依據的「糧食大豐收」來自他們自己親身參與的浮誇風。農民也更為擔心，糧食被高額徵購後，接踵而至的將是

---

<sup>86</sup> 田林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田林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6），頁16；秦暉，〈我的「早稻田大學」〉，《天涯》，2004：4（海口，2004.7），頁32-40。

<sup>87</sup>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中共廣西地方組織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頁146。

<sup>88</sup> 〈學習中央決議，辯清瞞產害處，巴馬隆林各公社幹部報出近二千萬斤糧食〉，《右江日報》（百色），1959年1月25日，1版。

<sup>89</sup> 〈有誰比黨親，我向黨交心〉，《右江日報》（百色），1959年3月12日，1版。

他們不得不自食惡果的糧荒饑饉。迷人的烏托邦宣傳顯然不敵冷酷的現實威脅。

#### 四、糧食供給制與酬勞工資制

《廣西日報》1958年11月8日第1版發表社論〈農民的一次大解放——論糧食供給制〉，鼓吹在農村實行糧食供應制，認為這是走向共產主義分配制度的一種過渡形式，是共產主義運動的新勝利；實行這樣一種分配制度，既是大躍進的產物，也是大躍進的迫切要求，農民不再為吃飯而操心，就會以全部精力投入生產建設，促進生產的發展。因此，社論強調：「吃飯不要錢，這是提起當前一切工作的綱，各級領導同志應該抓緊這個綱，把全盤工作推動起來。」<sup>90</sup>1958年11月26日《廣西日報》再次於第2版發表社論〈按時給社員發放工資〉，鼓吹在農村實行酬勞工資制，宣稱：「人民公社現行的分配辦法，包括兩個部分：一是糧食定量供給制，一是等級工資制。前者帶有『各取所需』的因素，後者仍是按照社會主義『按勞取酬』的分配原則。」<sup>91</sup>強調這是生產發展的必然結果，認為原本實行的工分制在生產大發展的今天，已經不適用了。

糧食供應制、吃飯不要錢，即公共食堂發揮的作用，這顯然是實踐毛澤東「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的願景。<sup>92</sup>其物質基礎，除了「實行『吃飯不要錢』，糧食由公社無償調撥」；<sup>93</sup>「糧食不足，由公社從較富有的大隊無償調撥」外，<sup>94</sup>主要基於「社員家庭所有的糧、菜、油、鹽、豬、雞、鵝、鴨等一律交給公共食堂」；<sup>95</sup>「取消社員自留地，把社員飼養的豬、雞、

<sup>90</sup> 〈農民的一次大解放——論糧食供給制〉，《廣西日報》（南寧），1958年11月8日，1版。

<sup>91</sup> 〈按時給社員發工資〉，《廣西日報》（南寧），1958年11月26日，2版。

<sup>92</sup> 毛澤東，〈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58.8.30），頁108。

<sup>93</sup> 平南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平南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頁156。

<sup>94</sup> 賓陽縣志編纂委員會編，《賓陽縣志》，頁212。

<sup>95</sup> 博白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博白縣志》，頁148。

鳴全部收歸公社」，<sup>96</sup>即將原屬農民家庭的一切私有生活資源剝奪殆盡，以支持「共產主義分配制度」。毛澤東對工資制亦有頗為具體而樂觀的設想：

實行工資制度，搞農業工廠，每個男人，每個女人，每個老人，每個青年，都有工資，發給每一個人，和以前分配給家長不同，直接領取工資，青年、婦女非常歡迎，破除了家長制度，破除了資產階級法權制度。<sup>97</sup>

廣西各地對工資制的實施，縣市志書多有介紹：賓陽縣「按月發工資，勞力及工資均分8級，每個勞動力2元至3元」；<sup>98</sup>平南縣「按月發工資，每個勞動力發3元至5元不等」；<sup>99</sup>武宣縣「一等勞動力每人每月發3.5元，二等發3.2元，三等發2.5元」。<sup>100</sup>其經費來源，或者如賓陽縣那樣，「沒有錢則到別的社、隊借，或向銀行貸款」；<sup>101</sup>或者如蒼梧縣——成立人民公社不評工記分，只評一、二、三等，社員每月發工資3元6角，一年發一套衣服。沒有經費，便販賣森林木材、石灰石，「如大坡公社賣銅鑊大山半原始森林的楠木，斬了木沒有運出來，便要供銷社付錢；夏郢公社賣蕉桐木，斬了一部分，便報有幾百萬條，東安公社指山賣石灰石也要供銷社付錢」；這種畫餅充饑、飲鴆止渴的方式最終也無法支持耗資龐大的酬勞工資制，「大部分公社只發了兩個月工資，後來沒有錢，停發了，發衣服也沒有兌現」。<sup>102</sup>天峨縣的案例亦如此：「全縣6個人民公社總共發放60,178元（工資），平均每個勞動力領到1.88元，但僅發3個月就沒錢了。」<sup>103</sup>地處桂東南的容縣，自然條件比地處桂西北的天峨縣好得多，但對糧食供給制與酬勞工

<sup>96</sup> 平南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平南縣志》，頁156。

<sup>97</sup> 毛澤東，〈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58.8.30），頁111。

<sup>98</sup> 賓陽縣志編纂委員會編，《賓陽縣志》，頁212。

<sup>99</sup> 平南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平南縣志》，頁156。

<sup>100</sup> 武宣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武宣縣志》，頁415。

<sup>101</sup> 賓陽縣志編纂委員會編，《賓陽縣志》，頁212。

<sup>102</sup> 蒼梧縣志編纂委員會編，《蒼梧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7），頁43。

<sup>103</sup> 天峨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天峨縣志》，頁194。

資制的堅持反更不如後者：「社社隊隊大辦集體食堂，實行社員吃飯不要錢，按月發工資。僅實行 1 個多月，因糧食緊缺而無法堅持。後來公共食堂陸續解散。」<sup>104</sup>可見現實的實踐與領袖的設想落差甚大。

中共當局敢於設置這樣一種超時代豪邁底氣的糧食供給制與酬勞工資制，便是建立在「農業大豐收」的虛假榮景之下的：靖西縣 1958 年「糧食獲得空前未有的大豐收，接著又實行了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受到了廣大社員的擁護」；<sup>105</sup>事實上，卻是「實行 2 個月即被制止」。<sup>106</sup>玉林專區 1958 年「糧食大豐收」，早造糧食總產量比上一年同期翻一番；於是，「全專區到 11 月 2 日止已有 112 個公社宣布實行糧食供給制加工資制，部分條件較好的社還實行基本生活供給制加工資制」。<sup>107</sup>然而，3、4 個月後，1959 年春夏間，卻因缺糧發生營養性水腫病，出現此症狀的達 2 萬多人。玉林縣委不得不發出防治水腫病的緊急指示，同時調撥救濟款和花生、食油、飯豆等約 12 萬餘公斤給各人民公社。<sup>108</sup>

如果說前述集體大生產人海戰術造成生活資源的隨機性浪費，那麼糧食供給制與酬勞工資制更造成生活資源的制度性浪費：「社員集中到公共食堂開飯，吃飯不要錢，一日三餐乾飯，無償平調原農業社及社員生產、生活資料，造成極大浪費。」<sup>109</sup>由此直接造成糧荒災情。例如：武宣縣 1958 年糧食本來就比 1957 年減產 13.6%，加上實行吃飯不要錢，更浪費了大批糧食，致使 1959 年至 1961 年全縣國民經濟發生了嚴重困難，糧食非常緊張，

<sup>104</sup> 容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容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頁 22。

<sup>105</sup> 〈靖西全面開展糧食普查工作，摸清糧底，建立制度，加強管理，武平公社渠來大隊清查結果，庫存數就比原報數多出三十萬斤糧食〉，《右江日報》（百色），1959 年 1 月 17 日，1 版。

<sup>106</sup> 靖西縣縣志編纂委員會編，《靖西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頁 33。

<sup>107</sup> 〈玉林專區的一百一十二個人民公社實行吃飯不要錢〉，《廣西日報》（南寧），1958 年 11 月 8 日，1 版。

<sup>108</sup> 玉林市志編纂委員會編，《玉林市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頁 35。

<sup>109</sup> 合浦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合浦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頁 24。

全縣因營養不良而得浮腫等疾病，造成非正常死亡 2.4 萬多人。<sup>110</sup> 田東縣 1958 年 10 月各社隊開始大辦公共飯堂，實行吃飯不要錢的「糧食供給制」或「伙食供給制」；次年 4 月，田東縣委就不得不發出〈關於整頓市場糧食供應工作的緊急指示〉，大幅壓縮城鎮糧食供應；5 月中旬到 6 月 10 日止，全縣先後發生水腫病 3,644 人，痢疾 646 人，腹瀉 671 人。<sup>111</sup> 平果縣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高潮中，自 1958 年 10 月下旬起，各地農村大辦公共食堂，普遍實行工資和伙食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但至 1959 年春便已鬧糧荒，缺糧的生產隊派人到外地要糧，往返數日，以致食堂斷炊，只好派人到縣城國營飯店排隊買粥回來分發給各戶，每人一碗。<sup>112</sup> 可見，糧食供給制與酬勞工資制的實施嚴重缺乏現實物質基礎，難以實行，亦很快就破產，還直接導致了瞞產私分現象產生。當時報刊揭露的相關瞞產私分現象即有：賓陽縣「木嶺生產隊因為不相信糧食供給制行得通，把倉庫裡裝的 6 千斤糧食瞞著不報」。<sup>113</sup> 田陽縣那麼公社副社長覃少星和群眾一起把 4 千斤穀子「埋伏」起來，就是因為「怕在青黃不接時，糧食一時供應不上，那時再用埋伏下來的『小糧倉』，食堂才能鞏固」。<sup>114</sup> 資源縣瓢裡公社相當一部分的隊幹部和社員，由於對糧食定量供應工作不理解，對集體食堂能否辦好缺乏信心，因而將 1958 年收穫的糧食的一部分打埋伏下來，向上瞞報產量。<sup>115</sup> 東蘭縣長樂人民公社有的幹部社員「耽心公共食堂辦不好，以後『垮臺散夥』沒有米吃，因此，在秋收中，有意私分和埋藏糧食」。<sup>116</sup> 前引隆林縣在 1958 年秋收時，幹部帶領社員瞞產藏糧，也就是由於看到公社沒有健全的糧食管理制度，不相信公社食堂能辦好。<sup>117</sup> 這種顧慮在當時是很普遍的，如

<sup>110</sup> 武宣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武宣縣志》，頁 415。

<sup>111</sup> 田東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田東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頁 23。

<sup>112</sup> 平果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平果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6），頁 121。

<sup>113</sup> 〈丟掉本位主義思想，插上共產主義紅旗——我區普遍開展核產報豐收運動〉，2 版。

<sup>114</sup> 〈埋伏糧食睡不安〉，《右江日報》（百色），1959 年 2 月 21 日，2 版。

<sup>115</sup> 〈發動群眾自報糧食的幾點經驗〉，《廣西日報》（南寧），1959 年 2 月 2 日，2 版。

<sup>116</sup> 〈中央決議象明燈，照亮了社員心，長樂公社三天核出糧食 195 萬斤〉，2 版。

<sup>117</sup> 〈學習中央決議，辯清瞞產害處，巴馬隆林各公社幹部報出近二千萬斤糧食〉，1 版。

報刊所披露：「食堂能不能辦得長久啊，如果辦不長久怎麼辦？家裡有小孩、老人、病人的怕食堂照顧不周到呀！」這些很實際的思想顧慮被作為「本位主義、個人主義」進行批判。<sup>118</sup>報刊假借農民之口慷慨陳詞：「現在吃飯不要錢，實行糧食供給制，人民公社這樣好，還自私自利為個人打算，太不對了。」於是「將私分的大米 640 斤一齊拿了出來」。<sup>119</sup>

可以說，糧食供給制與酬勞工資制是中共當局無視社會發展現實的局限而進行共產主義「窮過渡」的典型表現之一。<sup>120</sup>該制度的實施造成農民一度「放開肚皮吃飯」的浪費現象氾濫，亦即前述「生活資源制度性浪費」的突出表現：195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委員、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1915-1989）到岑溪縣視察期間，建議將東方紅公社公路彩門上的「鼓足幹勁生產，放大肚皮吃飯」對聯改為「認真鼓足幹勁生產，準備放大肚皮吃飯」。胡耀邦的修改表明其慎重態度，但原對聯卻顯示了當時現實中的實際情形。<sup>121</sup>欽州縣在「浮誇增產」的基礎上，取消家庭廚灶，辦起 3,600 多個公共食堂，全縣提倡「日吃三餐乾飯」、「放開肚皮吃飯」，由集體飯堂免費供應；卻因糧食奇缺，不久便不得不取消這種毫無物質基礎的「窮過渡」做法。<sup>122</sup>薄一波（1908-2007）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也承認：「實際上，許多基層幹部明白：由於估產方面的嚴重浮誇，上述關於所謂幾包乾的許諾，除了用來應付上級外，是根本無法實行的。」<sup>123</sup>

顯而易見，糧食供給制與酬勞工資制只能加劇導致集體資產迅速流失乃至集體經濟崩潰。然而，這種中共當局制度政策失誤造成的惡果，最終卻還須農民自己來承擔。

<sup>118</sup> 〈光榮的行動〉，《廣西日報》（南寧），1959年1月28日，1版。

<sup>119</sup> 〈田東在整社中做好糧食工作，都安紅星公社益黎大隊報出糧食七萬多斤〉，《廣西日報》（南寧），1959年1月21日，1版。

<sup>120</sup> 許滌新，〈論「窮過渡」〉，《經濟研究》，1979：4（北京，1979.5），頁2-7。

<sup>121</sup> 岑溪市志編纂委員會編，《岑溪市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6），頁20。

<sup>122</sup> 欽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欽州市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頁37。

<sup>123</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527。

## 五、三種現象的統合作用及其後果

上述 1958 年的「糧食大豐收」、「人民公社化」、「糧食供給制與酬勞工資制」三種現象，從時間來看，「豐收」浮誇現象最早且蔓延最久——1958 年初就有「春耕生產誓師大會」，提出豐收願景；<sup>124</sup>夏收便以「各地田頭不斷出現『萬斤畝』、『五萬斤畝』、『十萬斤畝』的增產指標牌」顯示「浮誇風愈演愈烈」；<sup>125</sup>人民公社化後的秋收，「大豐收」更是全面開花，遍地結果。8 月湧現的「人民公社」現象，使農村人力資源、生產資源、生活資源完全體制化，浮誇風也得以體制化發展，而且使浮誇風從生產領域蔓延到消費領域——即糧食供給制與酬勞工資制的實施。當局視之為走向共產主義分配制度的過渡形式，共產主義運動的新勝利，並且強調：「吃飯不要錢，這是提起當前一切工作的綱」。<sup>126</sup>大有以消費促進生產，以勝利成果論證大豐收之勢。值得注意的是，《廣西日報》1958 年 11 月 8 日第 1 版發表社論〈農民的又一次大解放——論糧食供給制〉，鼓吹在農村實行糧食供應制，但前一日，即 11 月 7 日，《廣西日報》第 2 版便通過社論與報導，宣布「我區普遍開展核產報豐收運動」（即反瞞產運動）。<sup>127</sup>至此，浮誇豐收、人民公社化、糧食供給制與酬勞工資制、反瞞產運動，諸種因素糾纏在一起了。但細心考察，亦可見其中錯綜複雜的關係：浮誇的「豐收」顯然是基本的導因，人民公社使「豐收」實現最大化，同時也實現了對農村人力資源與生產資源的壟斷；由此產生的糧食供給制與酬勞工資制一方面體現「豐收成果」以及集體化的「優越性」，一方面也以此全面控制農民的生活資源。而反瞞產運動在此時開展，卻正是前述諸種因素的矛盾糾結使然：浮誇風虛構的「豐收」無法兌現相應的糧食，引發「核產報豐收」的

<sup>124</sup> 灌陽縣志編委辦公室編，《灌陽縣志》，頁 20。

<sup>125</sup> 柳江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柳江縣志》，頁 18。

<sup>126</sup> 〈農民的又一次大解放——論糧食供給制〉，1 版。

<sup>127</sup> 〈丟掉本位主義思想，插上共產主義紅旗——我區普遍開展核產報豐收運動〉，2 版。

反瞞產運動；人民公社的集體化體制使反瞞產運動得以用軟硬兼施的各種方式推行，被集體化體制所束縛的農民只能別無選擇地承受一切。糧食供給制與酬勞工資制的實施加速了糧食的消耗，同時也為反瞞產提供頗為實際的論證依據：「人人都可以吃飽飯，而且還不花錢，再給社員多留一些就沒有必要了。」<sup>128</sup>於是，不僅餘糧，連口糧、飼料糧、種子糧都納入了反瞞產的範圍。

總的來說，大躍進催生漫無邊際的糧食高產衛星，造成大豐收的假象；人民公社化運動一方面強化了集體化對農民的人身約束力，一方面使因「大豐收」而超額徵購的措施得以強制推行；而糧食供給制與酬勞工資制的施行，致使農民的生活資源迅速消耗。三方面的統合作用力，最終歸結為強化了糧食之「得」（虛）與「失」（實）的反差；反差的惡化，自然導致了中共當局與農民全面對決的糧食戰爭——反瞞產運動。<sup>129</sup>

由此可說，廣西的反瞞產運動，其實就是一個由誤判到騎虎難下，最終造成巨大悲劇的過程。

所謂誤判，即起自 1958 年大躍進高潮中虛構了農業大豐收的假象，在「大豐收」基礎上進行的高徵購無法落實，自然就質疑糧食被農民瞞產私分了。待到反瞞產加重饑荒災情，已經是騎虎難下——鄉村無糧，<sup>130</sup>城市（包括縣城，下同）也糧荒。例如：田東縣自 1959 年 4 月 16 日起，全縣庫存商品糧僅能維持 2 天；5 月中旬起，開始出現水腫病人等不正常現象；6 月起，機關職工、城鎮居民中的成年人，口糧減至每月 7.5 公斤。<sup>131</sup>廣西首府南寧 1960 年 2 月春節剛過，便出現市場供應緊張形勢，市面食品奇缺，物價隨之高漲，糧食供應定量減少，不得不用瓜菜代部分主食，以致

<sup>128</sup> 〈插上思想紅旗，杜絕瞞產私分〉，《廣西日報》（南寧），1958年11月9日，2版。

<sup>129</sup> 該概念與相關論述，參見宋永毅，〈糧食戰爭：統購統銷、合作化運動與大饑荒〉，《二十一世紀》，136（香港，2013.4），頁68-84。

<sup>130</sup> 這種「騎虎難下」的窘境，跟1959年8月廬山會議決議反右傾關係亦甚大。第二次反瞞產就是在這種情形下於1959年秋後發動的。基於篇幅有限及論述聚焦考量，本文對此不展開論述。

<sup>131</sup> 田東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田東縣志》，頁105。

出現浮腫病情。<sup>132</sup>桂林市 1960 年 11 月初糧食及副食品供應緊張，引起市民普遍營養不良，浮腫病開始蔓延；1961 年 1 月 17 日，227 個單位共 6,768 人在大搞代食品運動中吃野山薯中毒，其中較嚴重的 1,211 人，928 人住院治療，5 人死亡。<sup>133</sup>

陷於如此困境，當局只好持續加強反瞞產運動來蒐集糧食，以施行「捨農村保城市」的策略。<sup>134</sup>上述城市糧荒現象於 1958 年底即出現，以致 1959 年初廣西反瞞產運動期間即有如此報導：為「支援國家建設和滿足城市、工礦區需要」，從 1959 年 1 月 21 日至 27 日，馬山、寧明、邕寧、都安等 7 個縣投入勞動力共達 11 萬 5,000 多人，集運糧食 2,300 多萬斤到交通點上，其中有 546 萬多斤糧食已裝包待運。<sup>135</sup>恭城縣由 1959 年 1 月 15 日至 21 日 7 天內，報出糧食 775 萬多斤，並已外調 60 多萬斤糧食支援桂林市。<sup>136</sup>百色地委第一書記尚持（1913-1996）在各縣委電話會議上要求「克服本位主義思想，堅決完成糧食外調任務」，尤其「對增產多的縣要求超額完成」。<sup>137</sup>靖西縣樹立「全國一盤棋、全區一盤棋」的整體思

<sup>132</sup> 南寧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南寧市志·綜合卷》（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頁 74。

<sup>133</sup> 桂林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桂林市志》（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86。

<sup>134</sup> 「捨農村保城市」的策略被認為是造成大饑荒的主要因素，如林毅夫和楊濤便將大饑荒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歸咎於「城市偏向」的糧食分配政策。參見 Justin Yifu Lin (林毅夫) and Dennis Tao Yang (楊濤), "Food Availability, Entitlements and Chinese Famine of 1959-1961," *The Economic Journal*, 110:460 (Jan., 2000), pp. 136-158. Bernstein 也認為，政府過高徵購糧食調往城市，是導致大饑荒出現的主要原因之一。參見 Thomas P. Bernstein, "Stalinism, Famine, and Chinese Peasants: Grain Procurement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ory and Society*, 13:3 (May, 1984), pp. 339-377. 古學斌則分析，政府當局為了更多徵購糧食，脫離現實情況，按鄉村可耕地面積決定農民出售餘糧的配額，以致造成了農民的饑荒。參見 Hok Bun Ku (古學斌), *Moral Politics in a South Chinese Village-Responsibility, Reciprocity, and Resistance*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3), p. 63.

<sup>135</sup> 〈根據流轉方向，合理擺佈糧源，保證城鄉需要，南寧區掀起糧食集運群眾運動〉，《廣西日報》（南寧），1959 年 2 月 1 日，2 版。

<sup>136</sup> 〈依靠群眾，摸清底細，靖西清理出糧食一千二百多萬斤，恭城報出大量糧食〉，《廣西日報》（南寧），1959 年 1 月 31 日，1 版。

<sup>137</sup> 〈地委召開電話會議，對當前糧食和生產作了重要指示〉，《右江日報》（百色），1959 年 2 月 22 日，1 版。

想，從 1958 年 7 月至 1959 年 2 月中旬，調出 1,300 多萬斤糧食支援城市。<sup>138</sup>在「全國一盤棋、全區一盤棋」的思想指導下，外調的糧食既支援廣西的城鎮亦支援外省城市及北京，如桂林地區在 1959 年 1 月就執行了「調運 500 萬斤糧食支援北京的任務」。<sup>139</sup>城市勉強保住了，鄉村卻加速滑向大饑荒的深淵。

廣西 1958 年的這種形勢，雖然跟全國其他地區相仿，但廣西的特殊性也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如前所述，1958 年初的南寧會議，不僅促進了全國大躍進，更直接為廣西大躍進注入強大的催動力，環江縣中稻畝產 13 萬斤的超級大衛星為代表的「糧食大豐收」便是直接的產物。

其次，落後地區的各級領導更具迫切焦慮以及急於求成的心態，於是無視廣西地處少數民族地區的特殊性，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進程中，不惜違反中央關於民族地區工作「慎重穩進」的方針；<sup>140</sup>南寧會議後，廣西當局更以「鼓吹地方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利用地方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的情緒」等罪名，將陳再勵（1887-1975，原省委常委、副省長）等人劃為「黨內右派集團」。<sup>141</sup>於是，激進主義壓制了民族政策。如前所述，廣西各地，尤其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如三江侗族自治縣、隆林各族自治縣、龍勝各族自治縣、東蘭縣、那坡縣、田林縣、環江毛南族自治縣、都安瑤族自治縣等，無論大放糧食高產衛星，人民公社化運動，還是實行糧食供給制與酬勞工資制，乃至貫徹「捨農村保城市」的策略，都可見急於求成而不惜手段、不自量力並無視後果的表現。

再次，如此急於求成的操作，導致原本就經濟落後的廣西地

---

<sup>138</sup> 〈靖西調運大批糧食支援城市〉，《右江日報》（百色），1959年2月16日，1版。

<sup>139</sup> 〈發揮協作精神支援首都人民歡度春節，桂林區超額完成糯米外調任務〉，《廣西日報》（南寧），1959年2月1日，2版。

<sup>140</sup> 不著撰人，〈中共廣西省委批轉省委統戰部民族工作組關於三江侗族自治縣目前互助合作運動情況與今後工作意見的報告（節錄）〉（1955.1.10），收入宋永毅主編，《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

<sup>141</sup> 駱明，〈光明磊落，慘淡一生——憶陳再勵同志〉，《文史春秋》，1997：5（南寧，1997.10），頁 2-4；黃榮，〈關於所謂「陳再勵右派反黨集團」的來龍去脈〉，《廣西黨史》，1999：5（南寧，1999.10），頁 31-32。

區更易於陷入缺糧 — 瞞產 — 反瞞產 — 饑荒的惡性循環，以致造成大量死人的悲劇性結局。

反瞞產運動中，無論是壓力所迫還是「積極主動」，農民報出的糧數大多是子虛烏有的，根本交不出糧，廣西當局只好「採取組織工作隊，到各家各戶搜查翻箱倒櫃，收繳所有的糧食」，<sup>142</sup>將農民的口糧、飼料糧、種子糧都搜刮而去。廣西反瞞產運動進行至此，無可避免演化為「國家 vs. 農民」、「國家與農民的衝突」。<sup>143</sup>地方當局甚至不惜採取殘酷暴力的鬥爭手段，製造出多樁駭人聽聞的事件，例如：「大新慘案」、「環江事件」、「寧明慘案」、「〔邕寧〕那樓事件」、「〔興安〕高尚慘案」、「〔那坡〕德隆核產事件」。農村基層幹部與農民備受摧殘，以致家破人亡。<sup>144</sup>最終釀成了遍及廣西鄉村的大饑荒悲劇，數十萬的廣西農民在和平年代饑饉而死。1993年出版的《廣西通志·人口志》稱：

1959-1961年由於受三年國民經濟暫時困難時期的影響，每年的死亡人數驟增，三年總共死亡人數145.10萬人，平均每年死亡48.36萬人，年平均死亡率為22.15%，是建國後廣西人口死亡率最高的一個時期。<sup>145</sup>

從1959到1961三年來說，基於11.84%的年均正常死亡率，<sup>146</sup>年均

<sup>142</sup> 隆林各族自治縣地方志編委會編，《隆林各族自治縣志》，頁338。

<sup>143</sup> 顧准，《顧准日記》（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頁169、頁227。

<sup>144</sup> 這些事件造成大量基層幹部與農民傷亡，當時報刊對此均無報導，除「環江事件」與「〔那坡〕德隆核產事件」外，其他事件在文革後的志書亦無載錄。「環江事件」參見環江毛南族自治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環江毛南族自治縣志》，頁337-341；「〔那坡〕德隆核產事件」參見那坡縣志編纂委員會編，《那坡縣志》，頁403-404。其餘事件均參見〈絞死土皇帝，槍斃韋國清〉，《南疆烈火》，聯5號，南寧，1967年6月8日，1-2版；〈絞死韋國清！為死難的廣西五十多萬階級兄弟報仇雪恨——揭發韋國清反瞞產的滔天罪行〉，《南疆烈火》，聯5號，南寧，1967年6月8日，3-4版。

<sup>145</sup>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人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頁61。

<sup>146</sup> 本文採用之「平均正常死亡率」，參見李閩榕、萬克峰，〈「三年自然災害」真的餓死3,000多萬人嗎？——對茅于軾先生《饑荒餓死人估算方法》的驗證〉，《當代經濟研究》，2013：12（長春，2013.12），頁83-89。該文經聚類分析，判定

非正常死亡人數約為 22.52 萬，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約 67.56 萬。同時期全國年平均死亡率為 18.08%，由此可計算出當時全國年平均死亡人數超過 1,200 萬，三年中死亡人數超逾 3,600 萬。<sup>147</sup>據此可作如下三點分析：(1) 1961 年 8 月 21 日，自治區黨委提交的〈關於三級幹部會議向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共中央的報告〉表明，1959 年初以來全自治區「非正常死亡達 30 萬」；<sup>148</sup>文革小報則揭露「據公安廳長鍾楓揭發，起碼有 50 萬」；<sup>149</sup>《廣西通志·人口志》記錄的「67.56 萬」數字顯然超於前二者。(2) 跟其他省市的志書相比，廣西志書對大饑荒的記錄更多是「採取含糊其詞的回避態度」，<sup>150</sup>故「67.56 萬」應仍是保守的數字。(3) 雖然在絕對數字上廣西在大躍進—大饑荒期間的死亡人數沒有某些省區多，在全國總死亡人數中的比例也不算高，但年平均死亡率 22.15% 卻比同時期全國的 18.08% 高不少，更遠超 11.84% 的全國平均正常死亡率。可見廣西的大饑荒災情亦不可謂不慘重。

廣西經濟發展落後，自然環境惡劣，顯然是不利條件，難以抵禦大饑荒的肆虐。但地廣人稀（尤其北部、西北部地區），自然資源（野生動植物）也相應豐富，倘若有較充分的人身自由，農民與生俱有的求生意志及頑強的生存能力必能自主發揮作用，不至於造成如此慘烈的人寰悲劇。由此顯見，廣西的大饑荒是人禍遠大於天災，而反瞞產運動也正是人禍的具體表現。

---

1955 和 1956 為正常年，基於這兩年的全國人口死亡率的平均值，設定「平均正常死亡率」為 11.84%。

<sup>147</sup> 國家統計局綜合司編，《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歷史統計資料彙編（1949-1989）》（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0），頁 2。關於 1959-1961 全國年平均死亡人數、三年總死亡人數的計算，為中央大學中文系博士生李達同學所貢獻，特此致謝！

<sup>148</sup>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大事記》，頁 349。

<sup>149</sup> 〈給毛主席的一封信〉，《南疆烈火》，聯 5 號，南寧，1967 年 6 月 8 日，2 版。

<sup>150</sup> 龍廷駒，〈比一比，想一想——試談志書與史書資料的差距〉，《廣西地方志》，1995：4（南寧，1995.8），頁 11-12、頁 53。

## 六、結語

綜上可說，大躍進浮誇風，掀起虛假的「糧食大豐收」熱潮，引發超額徵購，剝奪農民生活資源，促使農民以瞞產私分自保，亦從而導致當局進行反瞞產運動；人民公社化，進一步全面性剝奪農民的生產資源與生活資源，從而加緊禁錮、控制農民的人身自由，浮誇風益發興盛，超額徵購的強度與力度益發顯著；糧食供給制與酬勞工資制的實施，一方面剝奪了農民私有生活資源，一方面也加劇集體資產的迅速流失乃至集體經濟崩潰；農民不得不瞞產私分以自救，為保障城市與重工業區的需要，當局則以反瞞產運動搶奪糧食控制權。如此惡性循環，交相作用，導致廣西反瞞產運動的全面展開。

在上述過程中，中共當局領導人的因素也是至關重要的。除了前述毛澤東（通過南寧會議）對廣西大躍進的深刻影響，1958年至1961年，中共高層如周恩來、鄧小平、楊尚昆（1907-1998）、胡耀邦、董必武（1886-1975）、賀龍（1896-1969）、聶榮臻（1899-1992）、羅榮桓（1902-1963）、陳毅（1901-1972）、羅瑞卿（1906-1978）等相繼到廣西考察巡視，謝覺哉（1884-1971）寫詩讚揚環江畝產逾13萬斤，都對廣西大躍進起到激勵、鼓舞作用。<sup>151</sup>分管農業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副總理譚震林（1902-1983），在環江畝產逾13萬斤事件發生一個月後即大加表彰：「農業生產取得了這樣大的一個勝利，這個意義是非常重大的，這不是一個簡單的糧食問題，或者經濟問題，這是一個政治問題，這就是說在一個六萬萬以上人口的國家，一年把糧食問題解決了。」<sup>152</sup>這樣一個表彰無疑極大助長了農業大躍進的浮誇風氣。在1960年初一次全國糧食工作

---

<sup>151</sup>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大事記》，頁330、頁333、頁335、頁342、頁343、頁346；岑溪市志編纂委員會編，《岑溪市志》，頁20；〈聽說環江豐收〉，《人民日報》（北京），1958年12月16日，8版。

<sup>152</sup> 譚震林，〈譚震林在陝西省級、西安市級機關黨員幹部大會上的報告〉（1958.10），收入宋永毅主編，《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電子版，香港：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2014）。

會議上譚震林則宣稱，廣西的糧食不是少而是多，廣西全省大約 30% 的核算單位有約 5 億斤儲備糧。<sup>153</sup>當時正值廣西大饑荒嚴峻之際，連南寧、桂林等城市都已出現糧荒災情，<sup>154</sup>譚震林如此表態，對緩解廣西饑荒災情顯然起不到任何積極作用。

廣西當局領導人在其間扮演的角色更值得關注。雖然難以確認，自治區主席韋國清在自治區政府工作報告宣稱 1958 年糧食特大豐收，是否知道數據有假，但當年「大豐收」代表作——環江中稻畝產逾 13 萬斤，出自地縣負責人（賀亦然、洪華）的操作，並且有眾多官員、專家現場見證，事後也有大學的教授與學生以及基層的幹部與群眾提出異議甚至上書投訴，<sup>155</sup>韋國清很難說完全不知情。而農業書記伍晉南在廣州會議擅自加碼虛報一百多個億的糧食產量，無疑是公然作假了。在未能獲得更為翔實的內部資料的情形下，<sup>156</sup>我們惟能根據現有資料判斷：當時擔任中共廣西第一書記的劉建勛（1913-1983）與負責全面工作的自治區主席韋國清都難辭其咎，應該負主要政治責任；而作為主管農業事務的書記處書記伍晉南等，亦應負起不容推卸的具體責任。

有意思的是，文革期間，韋國清與伍晉南各自成為廣西對立的兩大派所支持的自治區負責人。<sup>157</sup>兩大派都指責對方支持的自治區負責人為廣西反瞞產運動的元兇。<sup>158</sup>儘管雙方的指責都帶有

<sup>153</sup> 李先念、譚震林，〈李先念、譚震林在全國財貿書記會議上對糧食調運等問題的講話要點〉（1960.2.16），收入宋永毅主編，《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電子版，香港：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2014）。

<sup>154</sup> 南寧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南寧市志·綜合卷》，頁74；桂林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桂林市志》，頁86。

<sup>155</sup> 參見環江毛南族自治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環江毛南族自治縣志》，頁340-3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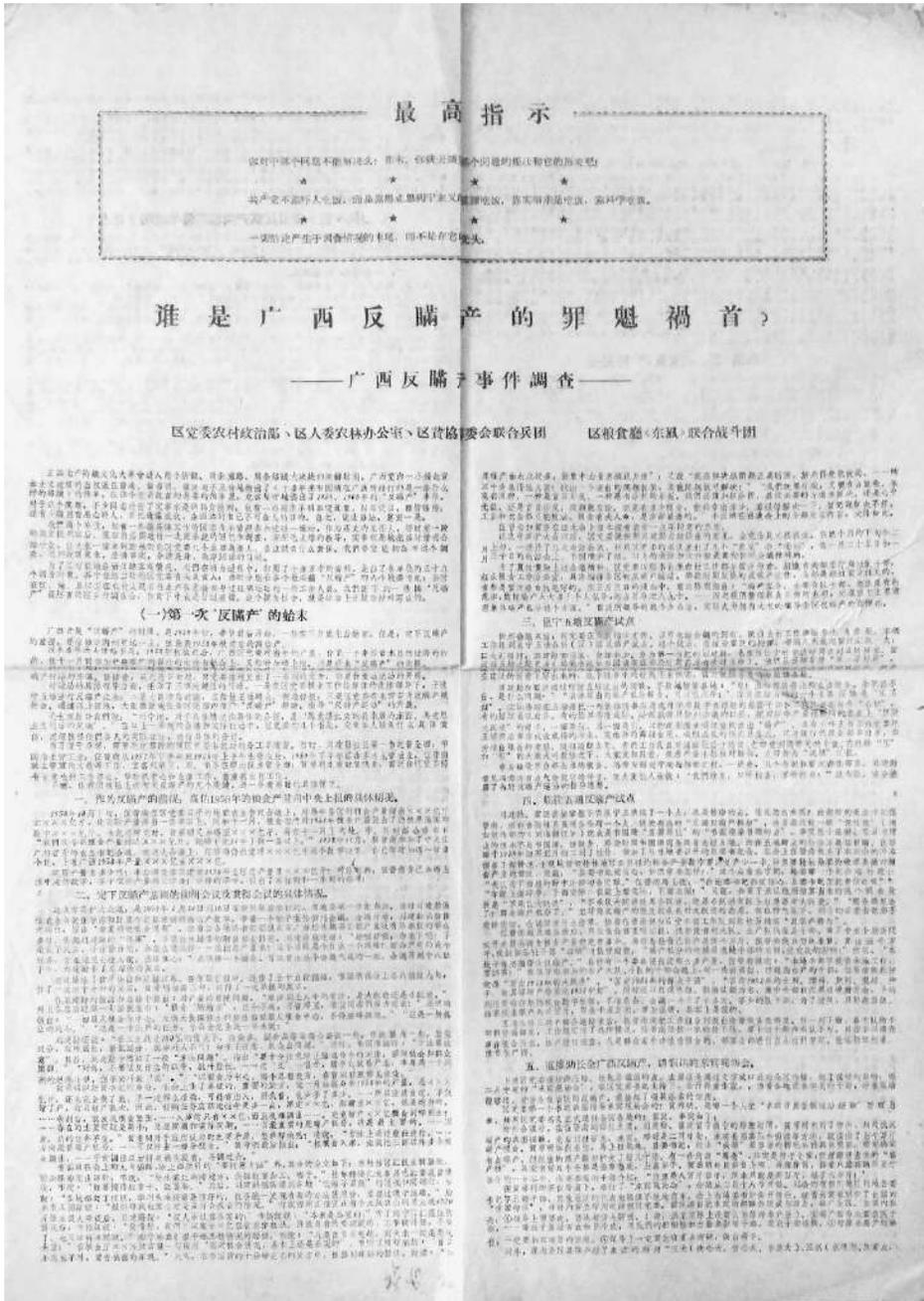
<sup>156</sup> 近年來，大陸相關部門的管控甚為謹慎且嚴格。2018年8月，筆者曾到廣西自治區檔案館，申請查閱相關的檔案資料如內部文件、會議記錄、調查報告等，卻因「身分特殊」（新加坡籍、臺灣教授），被要求到自治區外事辦、新加坡領事館等機構辦理「證明手續」，最終仍無法獲得任何資料。

<sup>157</sup> 兩大派：「廣西422革命行動指揮部」（簡稱「422」）與「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簡稱「聯指」）。前者支持伍晉南反對韋國清，後者則相反。劉建勛於1961年7月便已調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

<sup>158</sup> 〈絞死土皇帝，槍斃韋國清〉，1-2版；〈伍晉南的罪惡靈魂〉，《818戰報》（南寧），1967年5月16日，2版。

強烈的派性情緒而與事實有所出入，但都一致嚴厲譴責廣西反瞞產運動給農民造成巨大災難。

（責任編輯：王亭方 校對：洪慈惠）



附錄 1 《誰是廣西反購產的罪魁禍首？——廣西反購產事件調查》傳單正面圖》

資料來源：區黨委農村政治部、區人委農林辦公室、區貧協籌委會聯合兵團、區糧食廳「東風」聯合戰鬥團，《誰是廣西反購產的罪魁禍首？——廣西反購產事件調查》（1967年5月31日文革傳單，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平樂縣聯合總部，1967年6月30日翻印，作者自藏。



附錄 2 《誰是廣西反購產的罪魁禍首？——廣西反購產事件調查》傳單背面圖

資料來源：區黨委農村政治部、區人委農林辦公室、區貧協籌委會聯合兵團、區糧食廳「東風」聯合戰鬥團，《誰是廣西反購產的罪魁禍首？——廣西反購產事件調查》(1967年5月31日文革傳單)，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平樂縣聯合總部，1967年6月30日翻印，作者自藏。

## 引用書目

### 一、文獻史料

#### (一) 縣市志書

三江侗族自治縣志編纂委員會編，《三江侗族自治縣志》，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2。

天峨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天峨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

巴馬自治縣志編委會編，《巴馬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3。

平果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平果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6。

平南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平南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

玉林市志編纂委員會編，《玉林市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

田東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田東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

田林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田林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6。

合浦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合浦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

岑溪市志編纂委員會編，《岑溪市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6。

那坡縣志編纂委員會編，《那坡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2。

來賓縣志編纂委員會編，《來賓縣志》，北京：知識出版社，1994。

宜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宜州市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

武宣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武宣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5。

南寧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南寧市志·綜合卷》，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

柳江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柳江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1。

柳城縣志編輯委員會編，《柳城縣志》，廣州：廣州出版社，1992。

容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容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

桂林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桂林市志》，北京：中華書局，1997。

博白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博白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

欽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欽州市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

- 象州縣志編纂委員會編，《象州縣志》，北京：知識出版社，1994。
- 貴港市志編纂委員會編，《貴港市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
- 賀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賀州市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1。
- 隆林各族自治縣地方志編委會編，《隆林各族自治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2。
- 資源縣志編纂委員會編，《資源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
- 靖西縣志編纂委員會編，《靖西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
- 寧明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寧明縣志》，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8。
- 蒼梧縣志編纂委員會編，《蒼梧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7。
- 賓陽縣志編纂委員會編，《賓陽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
-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人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
-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大事記》，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
-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中共廣西地方組織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
-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財政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5。
-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農業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5。
- 龍勝縣志編纂委員會編，《龍勝縣志》，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2。
- 環江毛南族自治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環江毛南族自治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2。
- 灌陽縣志編委辦公室編，《灌陽縣志》，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
- 靈山縣志編委會編，《靈山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
- 靈川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靈川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7。

## (二) 報刊

- 〈一面走群眾路線的紅旗——記博白巨龍公社黨委書記卜功壽同志的事跡〉，《大眾報》，玉林，1959年2月11日，3版。
- 〈人民代表高歌大躍進，區人代會代表分組討論政府工作報告〉，《廣西日報》，南寧，1959年12月21日，1版。
- 〈中央決議象明燈，照亮了社員心，長樂公社三天核出糧食 195 萬斤〉，《右江日報》，百色，1959年1月20日，2版。
- 〈玉林專區的一百一十二個人民公社實行吃飯不要錢〉，《廣西日報》，南寧，1958年11月8日，1版。
- 〈田東在整社中做好糧食工作，都安紅星公社益黎大隊報出糧食七萬多斤〉，《廣西日報》，南寧，1959年1月21日，1版。
- 〈丟掉本位主義思想，插上共產主義紅旗——我區普遍開展核產報豐收運動〉，《廣西日報》，南寧，1958年11月7日，2版。
- 〈伍晉南的罪惡靈魂〉，《818 戰報》，南寧，1967年5月16日，2版。
- 〈光榮的行動〉，《廣西日報》，南寧，1959年1月28日，1版。
- 〈地委召開電話會議，對當前糧食和生產作了重要指示〉，《右江日報》，百色，1959年2月22日，1版。
- 〈有誰比黨親，我向黨交心〉，《右江日報》，百色，1959年3月12日，1版。
- 〈老根據地幹部群眾永遠和黨一條心，巴馬 1 天報糧 1,600 萬斤〉，《右江日報》，百色，1959年3月11日，1版。
- 〈扭轉右傾情緒，核實糧食產量，靖西三級幹部會報出 1,200 多萬斤糧食〉，《右江日報》，百色，1959年1月22日，1版。
- 〈依靠群眾，摸清底細，靖西清理出糧食一千二百多萬斤，恭城報出大量糧食〉，《廣西日報》，南寧，1959年1月31日，1版。
- 〈東風公社乘東風，英雄群中更英雄，硬要糧食畝產八千斤，向那坡、城郊、百育、兩琶、東關、新州及全專區各公社提出挑戰〉，《右江日報》，百色，1959年3月1日，1版。
- 〈按時給社員發工資〉，《廣西日報》，南寧，1958年11月26日，2版。
- 〈埋伏糧食睡不安〉，《右江日報》，百色，1959年2月21日，2版。

- 〈核實產量，保證豐收〉，《廣西日報》，南寧，1958年11月7日，2版。
- 〈核實糧食產量，鞏固人民公社，上游人民公社決心和資本主義思想作鬥爭〉，《右江日報》，百色，1959年1月20日，2版。
- 〈根據流轉方向，合理擺佈糧源，保證城鄉需要，南寧區掀起糧食集運群眾運動〉，《廣西日報》，南寧，1959年2月1日，2版。
- 〈破全省記錄，畝產 2,905 斤——介紹那坡社中稻高額豐產經驗〉，《右江農民》，百色，1958年5月3日，2版。
- 〈祝廣西大捷〉，《人民日報》，北京，1958年10月18日，2版。
- 〈偉大的十年〉，《人民日報》，北京，1959年10月6日，2版。
- 〈梧州南寧區開展核產報豐收運動〉，《廣西日報》，南寧，1958年11月15日，2版。
- 〈插上思想紅旗，杜絕瞞產私分〉，《廣西日報》，南寧，1958年11月9日，2版。
- 〈發動群眾自報糧食的幾點經驗〉，《廣西日報》，南寧，1959年2月2日，2版。
- 〈發揮協作精神支援首都人民歡度春節，桂林區超額完成糯米外調任務〉，《廣西日報》，南寧，1959年2月1日，2版。
- 〈絞死土皇帝，槍斃韋國清〉，《南疆烈火》，聯5號，南寧，1967年6月8日，1-2版。
- 〈絞死韋國清！為死難的廣西五十多萬階級兄弟報仇雪恨——揭發韋國清反瞞產的滔天罪行〉，《南疆烈火》，聯5號，南寧，1967年6月8日，3-4版。
- 〈給毛主席的一封信〉，《南疆烈火》，聯5號，南寧，1967年6月8日，2版。
- 〈隆林各族幹部社員熱烈學習六中全會決議〉，《右江日報》，百色，1959年1月11日，1版。
- 〈節約糧食光榮，賣餘糧受表揚，鳳馬大隊賣餘糧二十萬斤〉，《右江日報》，百色，1959年4月26日，3版。
- 〈群眾運動威力無窮——再祝廣西大捷〉，《人民日報》，北京，1958年10月20日，1版。

- 〈農民的又一次大解放——論糧食供給制〉，《廣西日報》，南寧，1958年11月8日，1版。
- 〈靖西全面開展糧食普查工作，摸清糧底，建立制度，加強管理，武平公社渠來大隊清查結果，庫存數就比原報數多出三十萬斤糧食〉，《右江日報》，百色，1959年1月17日，1版。
- 〈靖西調運大批糧食支援城市〉，《右江日報》，百色，1959年2月16日，1版。
- 〈學習中央決議，辯清瞞產害處，巴馬隆林各公社幹部報出近二千萬斤糧食〉，《右江日報》，百色，1959年1月25日，1版。
- 〈繼續深入貫徹總路線，保證我區1960年國民經濟全面大躍進，韋國清主席在區一屆二次人代會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摘要〉，《廣西日報》，南寧，1959年12月20日，1版。
- 〈聽說環江豐收〉，《人民日報》，北京，1958年12月16日，8版。

### （三）其他

- 不著撰人，〈中央轉發中央辦公廳綜合的「關於十六個省、區缺糧、斷糧、鬧糧情況和各地黨委提出的解決措施的簡報」〉（1958.4.25；中發〔58〕333號），收入宋永毅主編，《中國大躍進一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電子版，香港：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2014。
- 不著撰人，〈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1958.8.29），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十一）》，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頁446-450。
- 不著撰人，〈中共中央關於社員私養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個問題的指示〉（1959.6.11），收入宋永毅主編：《中國大躍進一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電子版，香港：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2014。
- 不著撰人，〈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1951.12.15），收入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頁411-423。
- 不著撰人，〈中共廣西省委批轉省委統戰部民族工作組關於三江侗族自治縣

- 目前互助合作運動情況與今後工作意見的報告（節錄）（1955.1.10），收入宋永毅主編，《中國大躍進一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電子版，香港：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2014。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 毛澤東，〈《發動婦女投入生產，解決了勞動力不足的困難》按語〉，收入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頁 674-675。
- 毛澤東，〈中央批轉一個重要文件〉，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八）》，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 52-53。
- 毛澤東，〈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58.8.30），收入不著撰人，《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1960）》，出版資料不詳，頁 111-114。
- 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1958.1），收入不著撰人，《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1960）》，出版資料不詳，頁 6-9。
- 李先念、譚震林，〈李先念、譚震林在全國財貿書記會議上對糧食調運等問題的講話要點〉（1960.2.16），收入宋永毅主編，《中國大躍進一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電子版，香港：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2014。
- 區黨委農村政治部、區人委農林辦公室、區貧協籌委會聯合兵團、區糧食廳「東風」聯合戰鬥團，〈誰是廣西反瞞產的罪魁禍首？——廣西反瞞產事件調查〉（1967年5月31日文革傳單），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平樂縣聯合總部，1967年6月30日翻印，作者自藏。
- 國家統計局綜合司編，《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歷史統計資料彙編（1949-1989）》，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0。
- 國家經濟委員會黨組，〈關於一九五八年計畫第二本賬的報告〉（1958.3.7），收入宋永毅主編，《中國大躍進一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電子版，香港：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2014。
- 譚震林，〈譚震林在陝西省級、西安市級機關黨員幹部大會上的報告〉（1958.10），收入宋永毅主編，《中國大躍進一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電子版，香港：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2014。

顧准，《顧准日記》，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

## 二、近人專書

朱宏源，《從變亂到軍省：廣西的初期現代化（1860-1937）》，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

林蘊暉，《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1958-1961）》，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9。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6。

Ku, Hok Bun (古學斌). *Moral Politics in a South Chinese Village-Responsibility, Reciprocity, and Resistance*,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3.

## 三、近人論文

王力堅，〈從「參與式」到「命令式」：廣西百色地區反瞞產運動初探〉，《二十一世紀》，175，香港，2019.10，頁 63-81。

何翔，〈大躍進時期，高鶴縣的「反瞞產」運動〉，《源流》，2011：3，廣州，2011.2，頁 30-31。

宋永毅，〈糧食戰爭：統購統銷、合作化運動與大饑荒〉，《二十一世紀》，136，香港，2013.4，頁 68-84。

李甫春，〈畝產十三萬斤的神話與環江的現實——環江縣 1958 年畝產十三萬斤事件及其嚴重惡果的調查〉，《改革與戰略》，1989：3，南寧，1989.6，頁 67-73。

李春峰，〈徐水共產主義試點始末〉，《黨史博采（理論）》，2006：2，石家莊，2006.2，頁 22-25。

李閩榕、萬克峰，〈「三年自然災害」真的餓死 3,000 多萬人嗎？——對茅于軾先生《饑荒餓死人估算方法》的驗證〉，《當代經濟研究》，2013：12，長春，2013.12，頁 83-89。

李藝，〈上海 16 家企業南遷始末〉，《廣西地方志》，2001：5，南寧，2001.12，頁 58-62。

周飛舟，〈「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國省級政府對災荒的反應和救助研究〉，《社會學研究》，2003：2，北京，2003.3，頁 54-64。

- 秦暉，〈我的「早稻田大學」〉，《天涯》，2004：4，海口，2004.7，頁32-40。
- 袁德，〈對河南省首先實現人民公社化的歷史考察〉，《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6，新鄉，1997.11，頁54-58。
- 張再興，〈「貴州事件」始末〉，《炎黃春秋》，2013：2，北京，2013.2，頁26-30。
- 許滌新，〈論「窮過渡」〉，《經濟研究》，1979：4，北京，1979.5，頁2-7。
- 陳欣德，〈毛澤東與南寧會議〉，《文史春秋》，1994：3，南寧，1994.6，頁6-8。
- 覃平，〈對建國後廣西經濟建設的反思——《廣西社會主義經濟編年史》前言〉，《改革與戰略》，1987：3，南寧，1987.6，頁40-49。
- 黃榮，〈關於所謂「陳再勵右派反黨集團」的來龍去脈〉，《廣西黨史》，1999：5，南寧，1999.10，頁31-32。
- 劉紹衛，〈南寧會議與廣西的歷史考察〉，《柳州師專學報》，2010：2，柳州，2010.4，頁75-79、頁104。
- 駱明，〈光明磊落，慘淡一生——憶陳再勵同志〉，《文史春秋》，1997：5，南寧，1997.10，頁2-4。
- 龍廷駒，〈比一比，想一想——試談志書與史書資料的差距〉，《廣西地方志》，1995：4，南寧，1995.8，頁11-12、頁53。
- 羅平漢，〈1958年的神話：「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黨史文苑》，2014：15，南昌，2014.8，頁26-33。
- 羅平漢，〈發動「大躍進」的1958年南寧會議〉，《黨史文苑》，2014：21，南昌，2014.11，頁27-33。
- 羅解三，〈實事求是，存真求實——讀《環江毛南族自治縣志·「大躍進」十三萬斤畝》的感想〉，《廣西地方志》，2005：5，南寧，2005.10，頁44-48。
- Bernstein, Thomas P. "Stalinism, Famine, and Chinese Peasants: Grain Procurement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ory and Society*, 13:3, (May, 1984), pp. 339-377.
- Lin, Justin Yifu (林毅夫) and Dennis Tao Yang (楊濤). "Food Availability,

Entitlements and Chinese Famine of 1959-1961.” *The Economic Journal*, 110:460, (Jan., 2000), pp. 136-158.

##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the Anti-Concealment of Harvests Campaign in Guangxi Province

Wang, Li-jian \*

### Abstract

From the end of 1958 to the beginning of 1960, the Chinese Communist government conducted two “anti-concealment of harvests” campaigns in the nation’s rural areas. These campaigns were the result of the collectivization movement then sweeping China; the height of the collectivization movement in 1958 was thus accompanied by an intensification of the anti-concealment campaign. In Guangxi province, the anti-concealment of harvests campaign was the result of three main factors: inflation of grain production figu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communes ahead of schedule, and the workings of the grain supply and wage payment system. Because of the confluence of these three factors, authorities in Guangxi vastly overestimated actual grain production figures. Suspecting that the villagers were hiding their abundant harvests, the authorities launched an anti-concealment of harvests campaign there. The campaign once launched proved difficult to stop; the result was a tragedy of immense proportions.

**Keywords:** Guangxi, the Great Leap Forward, People’s Commune, the Anti-  
Hidden Grain Production movement, the Great Famine.

---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Institute of History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